

DOI:10.12405/j.issn.2097-1486.2024.03.008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黄河流域农耕文明与现代 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构建

张瑾

山西师范大学社会学与法学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31

摘要: 农业是中华文明的根基与底色,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格局中历来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黄河流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农耕文明作为黄河文明的重要特质, 也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根植所在。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 从文明演进的历时视角把握黄河流域农业的经验价值, 构建起以传统农耕文明为基型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 为立足农耕文明、发展现代化农业提供学术参与及现实路径。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农耕文明; 现代农业体系; 科学技术; 黄河流域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7-1486(2024)03-0305-06

Farming civiliz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al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ZHANG Jin

College of Sociology and Law,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31 China

Abstract: Agri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t has always played a strategically significant role in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the important birthplace of Chinese farming civilization, and farming civilization, as an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the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is also the root of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technology system.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the continuation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Grasping the agricultural experiential value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evolution, can help build a multi-level, multi-dimensional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technology system based on traditional farming civilization, thus truly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unique advantage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also providing the modern agriculture with academic and practical pathways.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farming civilization; modern agricultural syste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Yellow River basin

0 引言

法国学者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在《农民的终结》中指出:“一二十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 这就是在 20 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1]。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与 20 世纪下半叶的法国相仿。在复杂多变的国际

环境中, 粮食安全问题被推到了世人面前, 我们必须守好耕地红线, 走中国式现代化的农业发展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导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回应西方现代化道路问题与人类总体性危机的基本提示, 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扬弃和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的重要逻辑之一^[2]。黄河流域传统农耕文明中不违农时、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等生态观念,以及耕作技术、农业理念、信仰传说等丰富的实践资源,反映出民众生产生活的经验和智慧。基于此,依托黄河流域传统农耕文明,大力推进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现代化,是实现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1 农业现代化的经验与反思

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是将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过程,这既包括农村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和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也包括农民主体的现代化。从经济结构层面的现代化看,农业现代化表现为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和非农就业创业机会不断增加的过程。伴随这一转型过程的经济结构特征是,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和农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占比不断减小,同时农业劳动生产率与非农劳动生产率逐渐趋同,从而消除城乡收入差距^[3]。从生产方式层面的现代化看,农业现代化表现为现代生产要素的导入与农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即不断用现代生产要素替代传统生产要素^[4],其中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农业生产工具的变革是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关键所在。从农民主体即人的现代化层面来看,农民主体与农业内部各要素之间有着直接性关系,其素质、思想、行为的现代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必要条件。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始终秉承“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农民是实践主体,同时也是价值主体,更是终极目的。

西方农业现代化道路起步较早,长期以来,西方理论界针对如何推进农业现代化,分别提出了结构变革视角下的二元经济论、内生增长视角下的改造传统农业论与禀赋异质性视角下的诱导创新论^[5]。二元经济论认为在农业体系内部存在着“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部门。在他们看来要想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必须将“维持生计”部门运转的低价劳动力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与二元经济论主张通过转移剩余劳动力到工业部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方式不同,内生增长理论有了长足的进步。该理论主张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要引入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具体举措包括建立一套适用于传统农业改造的制度、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为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创造条件、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等^[6]。而诱导创新论认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还取决于该国在土地和劳动力方面的资源禀赋。诚如日本学者速水佑次郎(Yujiro Hayami)所言,农业技术的发展虽然不能代替土地和劳动本身,但是

却能够起到类似于催化剂的作用,促进资源禀赋中那些相对稀缺的、昂贵的生产要素被相对丰富的、廉价的生产要素相取代^[7]。正是基于上述三种理念,近代西方走出了三条不同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一是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为代表,这些国家地广人稀,优先发展农业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缓解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二是以日本、荷兰等为代表,这类国家自然资源缺乏,人多地少,劳动力相对充裕,优先发展生物、化学技术、进行精耕细作,提高土地生产率、实现后农业机械化;三是以法国等国为代表,既缺乏劳动力,耕地也不多,生物技术和机械技术并举,促进土地适当集中。

毋庸置疑,西方国家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是一条高效率、低就业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国家农业现代化道路相比较,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是在农村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发展不充分的背景下推进的,需要探索在深化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路径,进一步强化农村市场化建设,加快推动农业向市场化、社会化的大农业转型^[8]。显然,上述西方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如果走西方式农业现代化道路,将会给我们带来诸多无法解决的弊端和难题:首先,追求单一效率最大化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由此解放劳动力,城市就业无法完全吸纳,就会造成大量农民失业,从而演化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其次,这样一条去农民化的现代化农业之路,将会使人口流失的乡村,更加凋零和空心化。这种去农民的现代化农业,无法让乡村成为2亿农民就业、安居、幸福生活的乡村,那将是一个美国式的农场化的乡村,这样的现代化农业,与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目标相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9]。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必须在生产效率与充分就业兼顾、农业发展与乡村繁荣相协调中进行探索前行,只有这样的现代化农业,才能让中国农业成为能够保证农民就业、安居乐业、幸福生活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走出一条区别于西方农业现代化道路,既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又满足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可以说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快我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是历史必然,也是众望所归。

2 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实践经验与时代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主要依靠快速城镇化,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强劲动力,而农业农村发展明显滞后,传统农耕文明亦在这一进程中由显性存在转为隐性存在,如何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议题。中国传统农业文明通过现代转型以适应当代社会,同时实现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存续发展,厘清传统农耕文明的实践经验与时代价值,在农耕文明赓续中保证农村农业的文化情感连续性。

2.1 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内涵理念

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传统农学理论中,中国传统的“三才”理论将农业生产中的天、地、人三者视为整体,并强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作用。生活在黄河流域的民众依据天时,确定农业生产周期,凭借地的因素,兴修水利,引黄取水,在稳定的天、地条件中充分发挥人的作用,这是一个“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和谐系统。农业本身就是一个改造自然的过程,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要注意到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坚持高标准农田建设及农业基础设施的持续性投入,因时因地制宜发展符合地域特色的农业。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传统农业较低的抗风险能力使民众必须尽可能地利用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其中人物观念是互相磨合、长期调试、修补利用、量身打造的,而非消费主义的用后即弃,也并非标准化、普适化的工业产物。与此同时,发展出了物尽其用、一物多用的生产生活观,如水资源紧张的地区常常发展出独特的“水利”用水习俗,将有限的水用于人的生活而非灌溉。先秦时期,孟子在黄河中下游的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一带)谒见魏惠王,专门谈及了国家发展问题,记录于《孟子·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促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也是现代农业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在《“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中明确指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遵循农业生产规律,注重地域特色,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10]。

强烈的抗风险意识与危机意识。历史上黄河流

域自然灾害多发,因此在农业发展中极为注重各种农业风险的防范。可以说,黄河流域的农耕史正是一部治黄用黄的历史。正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指出:“黄河流域最大的矛盾是水资源短缺,黄河流域最大的威胁是洪水”^[11]。在黄河流域长期的农耕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农业风险防范经验,集中体现在防灾减灾和储粮备荒意识上。一是防灾减灾。早在秦代就以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每年地方降水情况及农田受益或受灾情况,并规定了固定的农业信息报送时间和方式。二是储粮备荒意识。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官方主导的常平仓,为黄河上游的汉代边郡地区筹备军粮减少运输损耗,隋代又出现了民间备荒性质的社仓。三是多种经营与轮作种植。为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以对抗自然风险,传统时期的农业往往会尽可能地多种经营与轮作种植。历史时期的黄河滩地区因洪水频发导致河道经常变动,土地盐碱化严重或直接被淹没,使这一地区的农业呈现多种经营、因地制宜的样貌。土地地势高或肥沃的小麦与玉米轮作;较贫瘠的以各种豆类轮作;盐碱化的种植棉花或发展制碱业。土地被淹没则发展水田渔业和渡口航运业。同时,个体的抗风险能力明显低于集体,传统时期常多村联合修建水利设施,并进行协商共管,一渠共用。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构建,既要重视如何稳产丰收,又应有农业风险意识,通过健全农业防灾减灾体系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重视农业生产资料。传统农业依赖牛耕,耕牛是极为重要的生产资料。从先秦起即有诸侯无故不杀牛的禁制,秦汉时期不仅在法令上保护耕牛,更重视耕牛的精养,魏晋时期杀牛处罚更加严厉,唐宋以后禁杀牛的法则条款细化,对耕牛的保护越来越成熟。对耕牛的重视亦体现于民俗文化上,中国有着深厚的牛文化传统,传统农事图像中牛耕图较为多见,有关牛的传说、故事、谚语、歌谣亦不鲜见,都体现在民众对于农业生产资料的重视。同时,牛耕方法与农具的演进亦说明传统农业对生产资料的重视。在农业生产中土地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小农经济存在的前提是耕者有其田,历代王朝皆重视土地制度问题,而农民亦十分重视土地产权的明确与边界划分的清晰。鱼鳞图册技术自宋代开始出现,明清至民国长期作为土地划界手段的同时愈发成熟复杂,以民间存在的大量地契、交易凭据等文献,皆可说明传统时期农民对于土地产权的重视,也为当下如何深化完善土地经营制度提供了宝贵经验。

2.2 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现实价值

黄河中下游充足的水量、适宜的气候、平坦的地形,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同时形成了以农耕文明为中心的农业习俗、民间信仰、组织制度、民间文艺等类型丰富、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黄河流域农耕文明弥布于纷繁复杂的生活事象和行为活动之中,黄河流域民众在数千年生产生活实践中积淀的农业文化,包括处理人地关系、人水矛盾的经验,体现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朴素哲理;民间组织的治理智慧和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是乡风文明建设、农民审美培育的重要资源;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经验既体现在农民日常的生产实践中,也蕴藏于历代农书、农业谚语、乡土村志、农耕文化遗产中,是确保粮食安全、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宝贵资源。在构建黄河流域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过程中,黄帝、炎帝、大禹、关帝等跨省域民间信仰以及由此生成的庙会活动,成为区域经济交流的重要平台,有利于区域社会认同的形成。黄河流域依托古村镇、古渡口、古建筑等有形的文化遗址,以及地方戏曲、民间习俗、传统工艺等民间文化资源,加强与乡村旅游产业之间的互动与融合,打造具有地方标识和国际影响力的黄河乡村文化旅游品牌,使其成为区域文化产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12]。

农村生产活动的范围决定了村落的聚居形态,促进了村落的产生。村落生活着的人们将田地与家园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是密不可分的系统,田地状况也是衡量一个家庭经济规模的重要指标。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多数人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形成了故土难离的乡愁情结。在《诗经·采薇》中:“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描写了戍边之人在异乡的土地上采食薇菜时流露的盼望回家的乡情。中国诗歌史上的田园诗派也留下了大量的农业生产生活的诗篇,乡村成为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古人也将“耕读传家”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理想图式。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城乡之间的流动加快,特别是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村,却始终与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农耕文明遗留下的乡土情结,使人们总是表现出难离故土的文化心理。“乡愁”也成为农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愁也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情结,农业农村现代化并非是要与传统农业农村割裂。

黄河流域农耕文明实现了务实精神和景观美学的统一。从农业生产的务实性来看,作为中国农业

最早的发祥地和中心的黄河流域,先民们在这里耕种繁衍,数千年来积累下了丰富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活经验。在各个时期探索和实践了最为实用的耕作技术、育种技术和种植技术,发展了水利、气象、养殖、防灾等方面的知识,如何高效地生产贯穿了农业发展的始终。在坚持农业务实的前提下,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另一特色是孕育和生发了面向农业的美学。黄河流域农产品的美,体现在鲜明的农产品地域特色中,如在沿黄地区产出了湟中蚕豆、兰州百合、宁夏大米、沁水黄小米、章丘明水香稻等,从数量上看,截至2022年2月25日,全国汇总登记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共计3510项,其中在沿黄九省(区)的有1363项,占比约38.8%。农业的景观美学,表现为一种具有在农业劳动场景中的身体美学,身体在重复性的劳作过程中锻炼出最省力、高效的劳作姿态,对农业劳作的审美也同样寓于个体发展评价中。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也间接塑造了农业景观的美学,不仅是形成了因地制宜的地方聚落,如内蒙古的蒙古包、黄土高原的窑洞、山西传统砖石民居等,还体现在沿黄地区留下了数量丰富、类型多元的农业文化景观,如宁夏引黄灌溉古渠系、陕西山西旱作梯田、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等等。

3 黄河流域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建构

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黄河流域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是黄河流域传统农业文明向绿色生态文明转型的关键,也是未来农业文明的发展方向。这是一个涵盖多部门、全方位、长链条的系统战略工程,涉及农业资源现代化管理、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制度优化、农业从业人员素质教育提升、现代农产品贸易市场化扩大等方面,以实现农业生产可持续性、环境友好性和生态平衡的发展目标。

3.1 农业科技创新

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是指在农业领域不断引入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方法,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质量和可持续性。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在保留和继承传统农耕技术和农业体系的基础上,加大对农业科技研究的投资力度,以开发更环保的农业技术和方法,包括基因改良、农业机械化、智能农业和精准农业等领域的创新。农机化、高产栽培、农业科技创新、病虫害控制等,均须有助于保护农田周围的生态多样性,有助于维持自然生态平衡,防止害虫和病害的传播,最终实现农业产出的提升和农民收入的增

加。这些创新技术在现代农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助于解决食品安全、环境可持续性和全球粮食供应等挑战,对于提高农业产出、降低成本和改善农民生计都具有重要意义。

3.2 农业资源现代化管理

目前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依然脆弱,农业生产生活所需的水、土地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因素一直制约着现代农业的发展。黄河流域9省区的生态基础、农业结构和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开展生态农业实践,实施有机农业、农业多样化、生态恢复和农业生态系统的保护,有助于改善土壤和水质。通过合理的轮作、翻耕和土壤保护措施,以减少土地侵蚀、退化和生态系统的破坏,也可以对土地资源进行可持续的保护。水资源管理方面,实施高效的灌溉系统,减少过度抽取地下水,可以最大程度降低水资源的浪费;采用雨水收集和水资源再利用技术,以减轻农业对水资源的依赖。此外,选择适合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高产、抗病虫害和适应力强的优良农业种质资源,也是提高现代化农业生产效率的基础保障。

3.3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制度优化

我国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制度经历了多次改革和转变,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下的农业和农村发展需求,要不断加强组织制度的建设和优化。如推动农村合作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改革和发展,致力于集中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以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加强农村互助组织,帮助农民协作解决一些共同问题,如土地整治、灌溉、农业技术等;鼓励农村地区发展电子商务,让农民可以通过互联网销售农产品,同时还支持成立电商合作社,帮助农民更好地利用在线销售平台;扶持一些地区和农民积极参与大规模商业农业,成立农业公司和农业大户,以更现代的方式管理农业生产。此外,进一步搞活农村土地流通机制,鼓励农村土地流转,采用农地承租、租赁或股权合作等多种形式,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3.4 农业从业人员素质教育提升

现代农业的发展最终要靠人来实现,农业从业人员素质水平的高低决定了我国农业的现代化水平。提供农民和农业从业者有关生态农业和可持续农业实践的培训和教育,有助于推广最佳实践,并确保农业人员了解现代生态文明的原则;改善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确保农村儿童能够获得良好的教育;设立农村技术学院和职业学校,鼓励更多的农村青

年接受高等教育,以培养更多的农业专业人才;建立农村图书馆和信息资源中心,为农民提供农业知识和信息的获取途径,帮助他们不断学习和更新知识;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农村电子学习平台,为农村居民提供在线教育资源,包括农业课程和培训材料。通过上述方法和策略,可以提升农业从业人员的教育素质,改善农村生活质量,对于解决农村地区的问题和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3.5 现代农产品贸易市场化扩大

实现现代农产品贸易市场化扩大是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政府可以投资兴建现代的农产品市场,提供冷链设施和储藏设施,以确保农产品能够储存和销售;支持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同时也提供线上交易和物流支持,实现农产品从产地到市场的快速销售;鼓励农民组成农产品合作社,通过集体销售和采购,增强他们在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和市场影响力;帮助农产品建立品牌和获得标志认证,以提高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信誉度;建立市场信息和大数据平台,便于农民了解市场需求、价格趋势和竞争情况,以及时做出交易决策;支持成立农产品贸易协会,举办或参加各种农博展会,促进农产品的推广和销售,同时也为买家和卖家提供交流和合作的机会,特别是加大农副产品国际贸易市场的开拓力度,制定出台相关贸易政策和法规,以减少贸易壁垒和促进市场开放。

4 结语

黄河流域赓续着中华民族的农耕传统,对土地的热爱和农业生产的重视流淌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中。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转型无法忽视农耕文化基因上的血脉关联,既要参照西方乡村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又要从传统农耕文明中发掘有益元素,最终滋养出对接历史传统、适应现代生活、提高群体修养的新的乡村文明。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13]。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也为乡村振兴实现农村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黄河农耕文明继往开来,赓续不怠,能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提供多重助力。“现代化”作为一种源自西方并形成全球性思潮的重要概念,以西方世界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成过程为历史来源,提取其精神伦理内核,构成其关于落后国家社会如何变为先进的理论,具有鲜明的进化论色彩。西

方现代化理论视西方道路为唯一现代化模式,将西方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把现代化与各国传统对立起来。西方现代化理论无视欠发达国家的文化价值,对社会演进的标榜暗含对自身道路唯一正确性的强调,排斥多元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是以人为本的现代化,而非以资本为原则的西方式现代化,是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现代化,而非以物质现代化为中心的单一现代化,需警惕唯物论、唯市场论与唯规模论,关注农民对土地的文化需求。

传统的小农经济具有强韧性,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世代传承的农业文化精神有助于补足农业现代化的不足,加强农村文明精神建设,实现农业农村的全面现代化。挖掘黄河流域传统农耕文明的实践经验,将其植入现代农业体系的构建中,有助于实现生态平衡、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农耕文明的赓续。除推动的农业科学技术进步、提高农民知识教育水平外,也必须注重完善土地确权与户籍制度改革,推进三产协同与产业融合,多种种植与多元化经营,形成产销一体的规模化农业,提升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黄河流域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重要区域,与建设中国特色农业强国的目标相得益彰,是深入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内生动力,发掘并利用好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能够有效赋能黄河流域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构,扎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参考文献:

- [1]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
- [2] 吴佳妮,滑子颖,马健生.世界文明形态多样性视域下教育现代化的中国道路[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27(03):121-129.DOI:10.14119/j.cnki.zgxb.2023.03.013.
- [3] 黄季焜.乡村振兴:农村转型、结构转型和政府职能[J].农业经济问题,2020,41(01):4-16.DOI:10.13246/j.cnki.iae.2020.01.001.
- [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课题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293.
- [5] 孙生阳,邹一南.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西方镜鉴与中国选择[J].理论视野,2023(08):43-49.DOI:10.19632/j.cnki.11-3953/a.2023.08.007.
- [6] 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9.
- [7] 郭熙保,苏甫.速水佑次郎对农业与发展经济学的贡献[J].经济学动态,2013(03):101-108.
- [8] 涂圣伟.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J].经济纵横,2023(01):84-92.DOI:10.16528/j.cnki.22-1054/f.202301084.
- [9] 习近平.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切实抓好农业农村工作[N].人民日报,2022-12-25(01).
-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EB/OL].中国政府网[2023-11-03].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2/11/content_5673082.htm.
-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EB/OL].中国政府网[2023-09-26].https://www.gov.cn/zhengce/2021-10/08/content_5641438.htm.
- [12] 段友文,张瑾.晋陕豫民间文化的生成演变与价值发现[N].光明日报,2022-04-06(11).
-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4-02-04(01).



张瑾,女,博士,山西师范大学社会学与法学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社会文化。在光明日报理论版、湖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史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多项工作。邮箱:809365609@qq.com

(责任编辑:彭 鹏)